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2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 2 2008
(第7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7)

关于后现代主义文化命意的批判性考察

李胜清

(湖南科技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与社会文化研究基地, 湖南 湘潭 411201)

摘 要: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存在,具体表现为;"后现代"命名具有反讽性,它的断代并不彻底,潜含着与现代甚至前现代的连续性关系。后现代主义解构了宏大叙事和总体性观念,但它本身也表现为一种策略或功能形态的否定性宏大叙事和总体构架。后现代主义的内在悖论使它更多的是提出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

关键词: 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功能性命名;断代;表意悖论

中图分类号: G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0202(2008)02-0093-06

作为当代社会经济、政治语境的一种文化镜像,后现代主义无疑构成了当下诸多文学文化实践活动的主导叙事逻辑与绝对阐释视阈,否认这一点显然是不明智的。但承认这一点决不意味着后现代主义已经杜绝了人们对于其本身合法化存在的质疑,也不意味着它对于任何文学实践与文化经验都具有充足的判断能力与阐释效力。

一、后现代命名的吊诡性

处身于一种后现代文化语境中,人们必须接受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当下各种相关的后现代言述已经成为了宰制我们生活的理论新贵,任何想超逸出后现代指涉关系的举动似乎都被证明是无效的。但是人们也必须正视这个事实的另外一个维度,即虽然各种具体的理论言述都被统摄到后现代的称谓之下,但是它们各自所表征和负载的后现代意义与价值向度却并不尽然一致。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并没有形成为一种实体性的、意义单一的理论话语体系,在其现实性上,它毋宁说是作为一种对于性状各异的诸多具有不同价值趋向的理论话语与诗学问题的功能性命名,以此来策略性地描述这些不同理论言述的语境特色与共在关系。

关于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与诗学话语的歧义性与驳杂景观,伊格尔顿曾经精辟地指出过,"如果后现代主义涵盖了从朋克摇滚乐队到元叙事的死亡,科幻小说杂志到福柯,那么很难看出任何单一的解释性纲领如何才能正确处理这样一个异乎寻常地不同质的实体。如果这一创造物是如此地多种多样,那么很难看出人们怎样才能在某种简单的意义上说或是赞成它或是反对它,正如人们不能赞成或者反对秘鲁一样。如果的确存在任何后现代主义的整体,那么它也只能是一个维特根斯坦式的'家族貌似物'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说,它似乎提供了一个它自己的教条地反本质主义的指导性范例。"[1]29这就意味着,后现代主义这个共识的称谓其实掩盖着内部诸多观点的纷争,它表明,后现代主义虽然已经被人们所接受,但在实质上仍然是一个成问题的并且有待进一步获得规定的话题。正像后现代主义之质疑现代主义一样,它本身也必须接受各种质疑与审视。而这种情势就暗示我们,在面对纷繁涌现的新事物、新经验和新体验时,人们并不能轻率地使用后现代一词来对之进行笼统地界定,因为当用来分析和归纳文化文学经验的理论话语本身尚处于一种

收稿日期:2007-12-29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基金规划课题(07YBB221)

作者简介:李胜清(1971—),男,湖南耒阳人,湖南科技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

问题状态而非答案状态时,它的分析与阐释也就可能是无效的或失当的。所以面对已经炙手可热的后现代主义言述,我们依然要大胆地置疑:后现代主义及其诗学话语的合法性程度怎样?对于各种文化艺术经验,它是否具有均质的阐释效力?如果没有,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最后,它目前更多地是表征为问题还是答案?

姑且不论那些后现代主义的批评者,即便在那些被定性为后现代主义者的阵营内部,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论述就呈现出一种互相矛盾的尴尬局面,显然,后现代主义本身就存在着合法性危机的问题。人们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后现代概念使用的无序性与两可性,关于这一点,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和斯蒂文·贝斯特在他们合著的《后现代理论》一书中就有分析,他们虽然在抽象的层面上也指出了后现代话语的一些共性,但是一俟具体分析就得出了另外的结论,通过研究各种不同后现代主义者的不同论述,他们指出,"后现代话语中的混乱情况起源于它在不同学术领域和学科中的不同用法,事实上绝大多数理论家和后现代话语的评论者对后现代一词提供的定义和理解经常互相冲突,并且他们通常并没有对这个词作充分的理论阐述。"因此,"事实上,各种后现代话语所操弄的'后'这个词本身就有着一种内在的模棱两可性。"[2]37 这种"后"的两可性表现为它有时是对现代性的一种超越维度,有时又侧重于表明它与现代的亲缘关系身份,有时这两种意向又重叠纠结在一起,使人难以分辨出它本身的意义真相。就此而言,后现代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仅仅表达了某种形式上的雷同与语境色彩,至于其所包孕的具体意向则是复杂而矛盾的。很多分析家认为造成这一点的原因就在于后现代主义相对论的效应与其绝对论应用之间所固有的矛盾关系,有论者就指出,后现代主义的"积极意义受到它彻底相对论的限制。而且,尤其是当我们把后现代思想从它的特定西方环境挪开,勉强把它套用到处于现代化进程的非西方社会环境的时候,它的政治色彩和作用都必然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与其说是后现代理论本身的保守性,还不如说它的运用已经超过了它原先积极性的条件和限度。"[3]169 审视后现代主义在立意方面的偏颇,其诟病之处正在于它企图以一种有限的化约主义的后现代立场去应对甚至解决那无限多样且常常是无法通约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彼此之间的无法通约就注定了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公度性话语与共性模式的无效。基于这样的局面,每一种具体的理论言说都声称自己掌握了解决现代主义病灶的真理,但它们彼此之间却又处于一种解释权的争夺之中,在一个诸神并置并且都认为真理在握的论辩语境中,人们何从判断谁是谁非呢?如果任由这种情况恶性发展,不但答案会蔽而不明,就连对问题的真伪判断都会失去起码的准则。其结果在最好的情况下可能导致一种极端化的相对主义,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则可能导致对问题的虚无主义解答,而虚无主义的解答实质上就是没有解答。就目前一部分简单化的后现代主义的情况来看,它们似乎正在蹈上这样的畏途。

二、后现代的断代游戏

就表意动向而言,后现代的文化理论与诗学话语因为采用了相异于现代主义的问题框架而显示了一种断代的意义,正像有论者指出,"后现代主义者描述且通常拥护发生于知识、文化和社会中的断裂,频繁地攻击现代性,同时认同被他们吹嘘为新的、'激进的'后现代话语与实践,号召用新的范畴、新的思维和写作模式、新的价值和政治去克服现代话语和实践的不足。"[2]38 固然,在某种被严格限定的范围里,这种断代立场确实使得后现代的文化诗学话语在分析阐释社会文化经验时显示了现代主义所阙如的一些视角优势。但在现实关系中,后现代的文化诗学话语的断裂感却又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决绝与夸张,倘若无限放大这种断裂的意义而忽略它们两者固有的联系,那么作为现代主义的诊断者和救赎者出现的后现代主义本身就是另一个亟待诊断与救赎的对象。就此而言,后现代话语在断代问题上确实处于一种危险的游戏状态中,它可以成于这一点,更可以毁于这一点。

不要从旧的好事物开始,宁可从崭新的坏事物开始,布莱希特曾经如是说。话虽有些武断,但

是对于一部分决绝的后现代论者来说却堪称写照。正是由于受制于这样的一种致思模式，所以后现代的文化理论与诗学话语对于一切新事物都持毫不设防的欢迎态度，而那些所谓现代主义的旧事物则毫不留情地被判定为一些不能进入后现代“理想国”的历史羁绊。在某种意义上，后现代话语对于现代主义的敌视是故意的，在美国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威廉·斯潘诺斯的个案中就可见出一些端倪，他在比较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时所得出的结论几乎都是偏向于后者的，但在事实上，“他这个结论却是对现代主义作品加以削平和简化而得到的。首先，他将现代主义还原到仅有几位作家的作品，并进一步削平和简化为几个特点，诸如附庸风雅、严肃庄重、精英意识，最后将这些特点作为反动的东西而排除掉。”[4] 这种以自身的优势遮蔽甚至是故意丑化贬损现代主义的做法显然是有失公允的，很多严肃的后现代主义的批判者就非常不满于一些后现代论者的这种曲意选择性的行为，伊格尔顿说，“我谴责后现代主义时不时地假设它对手的立场或者把它对手的立场加以漫画处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后现代主义给予自己的待遇同样也惠及它的对手，伊氏对于后现代主义就是这样看的，“虽然我在这个论题上的评论一般说来是否定的，但是，我已经尽我所能，给予后现代主义以它应该得到的东西，在注意到它的弱点的同时注意到它的力量。”[1]2 另外一种情况则是意识到了后现代主义对于现代主义不同程度的意义关联，但是为了规避这种关联给他们决绝的断代立场可能招致的身份尴尬而不惜地走向了独断论的境地，利奥塔就深陷这样的泥淖，“他很不情愿设定了一个跟极端现代主义时期迥然相异的后现代主义时期，也不情愿地制造了一个根本的历史文化分裂。”[5] 而要从根本上减少其尴尬甚至是杜绝尴尬，就必须承认并尊重后现代话语与现代性话语的亲缘关系，惟有在这样一种辨证的关系语境中，后现代话语的断代行为才具有自身的积极意义，此时它既表明了后现代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话语所独具的一些问题意识，又暗示了这种后现代话语在系谱学上与现代性甚至是前现代性之间具有一种无法抹去的意义勾连关系。

连续性与非连续性只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在此关系构架下，连续性是原生的，而非连续性是派生的。就此而言，后现代的文化理论与诗学话语与现代主义的断代是有条件的，它的断裂以及如何断裂、断裂的程度和断裂原因都必须从它与现代主义的关系规定中获得最终的解释，否则，后现代话语的断代意义就无从获得语境支撑。因此，对于负责任的后现代论者来说，探讨后现代话语的断代意义固然重要，但是出于澄明前提与廓清参照语境的需要而追索其与现代性话语的复杂关系也是它的题中应有之义。关于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许多后现代论者都注意到了，像美国后现代论者福尔柯就曾经指出，“对现代主义的取代将导致对前现代的恢复和对后现代未来的探求。换言之，在我们构想后现代主义的美好前景时，吸取前现代的理解和智慧是有帮助的。”[6]141 因此，“要想走向后现代，我们就必须去发展和培养现实地存在于或潜在于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王国中的实践和意识。”[6]149 而利奥塔在反思后现代时也承认，“确切地讲，我们不得不说，后现代总是蕴含在现代之中，因为现代性，现代的时间性本身就含有一种进入超越自身状态的冲动。……现代性本身就不断地孕育着它的后现代性。”[7] 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也认为，“后现代性并不必然意味着现代性的终结，或现代性遭拒绝的耻辱。后现代性不过是现代精神长久地、审慎地和清醒地注视自身而已，注视自己的状况和过去的劳作，它并并不完全喜欢所看到的东西，感受到一种改变的迫切需要。后现代性就是正在来临的时代的现代性……后现代性就是与其不可能性达成妥协的现代性；是一种自我监控的现代性，它有意抛弃那些曾不自觉地做过的事情。”[8]272 特别在文学文化领域，现代主义总是后现代主义一个如影随形的参照项，没有现代主义的参照，则对后现代主义的阐释只能是缺位的，在这方面，就有研究者指出，“后现代主义小说自然是对于现代主义小说而言的，如果不同现代主义进行比较，则无从论及和把握后现代主义小说。”[9]74 原因就在于正是后现代主义构成了现代主义那种激进批判传统的当代延伸。正是意识到它们之间存在着这样的逻辑关系，所以很多学者都认为后现代主义的断代只具有相对的意义，这种相对性的断代立场恰恰显示了它对于现代主义的张力关系，而这种张力关系的具体内涵就是：

在现代性之中否定现代性,通过与现代性发生联系来拒绝这种联系。在此意义上,断代举措毋宁说是后现代主义为了标识与现代主义的身份差别而推出的一种文化策略,它的本然意义与实然目的恰好能被鲍曼诠释成这样:“作为划分知识分子实践之历史时期的‘现代’和‘后现代’,不过是表明了在某一历史时期中,某一种实践模式占主导地位,而决不是说另一种实践模式在这一时期中完全不存在。即使是把‘现代’和‘后现代’看作是两个相继出现的历史时期,也应该认为它们之间是连续的、不间断的关系。”[10]

如果根本不懂断代的这种复杂关系内涵,或者是洞悉了这种复杂的关系纠葛而依然坚持一种极端的断代立场,那么后现代主义就可能步入自我消解的境地。因为一旦作为参照与客体的现代主义被放逐,后现代主义本身的意义便无从兑现,有学者就指出,“一旦将所有的参照点与中心都消解与排除,解构本身的力度也基本被掏空了。因为解构的程序表现的是无法决定性,不能进行选择,因为它没有选择的任何标准。吊诡的是,它在它的自由游戏中悄悄地执行着自己的安乐死。本应是一种彻底的批判立场却无法进行真正的自我批判,这不仅是解构面临的危险和悖论,也是时下不少其他后现代思潮所面临的危险和悖论。”[11]它意味着,对于后现代主义的研究必须在一种关系语境中进行,更进一步说,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可以被置换为两个命题,即关于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关系研究或者这种关系中的后现代主义研究。

三、后现代表意的悖论

不同的哲学立场与逻辑框架意味着不同的价值选取与方法路向。后现代主义之于现代主义的根本异质性主要就是通过其具体的表意策略和应用方式来付诸实现的,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正是在一些具体的操作模式上践诺着它的理论使命与核心命意。按照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利奥塔的看法,那就是对于宏大叙事、总体性与主体性等问题的怀疑与颠覆,在其著名的《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中,利奥塔认为现代主义正是仰仗这些命题而获得自身的合法化的,“我们将使用‘现代’一词来命名这样一些科学,这些科学将求助于直接依赖宏大叙事而形成元话语以使自身合法化,而这些宏大叙事则包括诸如辩证法的精神,解释学的意义,理性或劳动主体的解放,或者财富的创造等等话题。”[12]251而现在,这些命题已经蜕变成了僵化与专制的代名词,完全丧失了存在的合理性,“就合法化元叙述机制的不合时宜而言,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出形而上哲学和建基于其上的学院制度本身也出现了危机。叙事功能已经失去其功效,因为能够产生原动力的伟大英雄,巨大灾难,伟大航行和崇高目标都已烟消云散。”[12]252客观地看,后现代话语确实敏锐地把捉到了现代主义的病灶,并且以其激进的锋芒对那些弊端进行了无情的解析与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揭露并解构了那种所谓的“形而上的集权主义恐怖”。事态的如此发展似乎本无可指摘,但后现代论者的决绝态度却使得事情的进展不但超出了而且也偏离了人们的预想,它们的将解构进行到底的本能冲动最终使它们逾越了自己的原初边界而陷身于进退维谷。一旦陷于这样的恶性怪圈,不但现代主义那些命题本有的积极因素被褫剥殆尽,而且我们还惊讶地发现,后现代主义似乎也遭遇了自己对手的那种宿命逻辑,即它的潜在话语与背景叙事中也出现了一副另类而滑稽的总体性面孔。对此,我们没有理由不同意王尔德的哀叹,“一个需要修补的世界为一个无法修补的世界所代替了。”[13]

正是在将总体性以及与之相连的宏大叙事、主体性等现代主义表意策略问题化的过程中也使得后现代主义本身成了问题的一部分,它对于这些命题的处理也裸呈出自己的悖论性,不自觉地呈现了现代主义的问题征候。后现代话语的表意悖论主要体现在两个相关的层面上。首先,后现代话语的非辨证立场导致它对于总体性的虚无主义态度。总体性构架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机械主义的实体论总体性模式,另一种是实践性的功能论总体性模式,前者幻想建立一种超越历史的、永恒不变的、主客二分的封闭而抽象的逻辑模式;后者则倾向于针对不同的历史关系建构一种动态

的、变化的、主客互为中介的具体性阐释模式。后现代主义正是因为一部分总体性模式的破坏作用而迁怒于全部的总体性模式，并且也将摧毁的领域不加分析地波及建设性的总体性。而在事实上，功能论的总体性是蒙受着冤屈的，因为就其主旨而言，它恰恰是被用来克服那种实体论总体性的一剂良药。关于这一点，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大量相关的论述可以作为佐证。卢卡奇针对两种不同性质的总体性模式被混淆的情况就曾经警告过人们，“我们重说一遍：总体的范畴决不是把它的各个环节归结为无差别的统一性、同一性。”[14]61 很显然，卢卡奇也是反对那种实体论的总体性模式的，但是，他认为那种极端个人主义的“恶总体性”也是不足取的，因为“从个人的观点里不会产生出总体，最多只能产生某一局部领域的一些方面，而且大多只能产生一些零碎不全的东西：一些无联系的‘事实’或抽象的局部规律。”[14]77-78 受制于这样的总体性，其结果就是或者根本提不出问题，或者只能提出一些伪问题。而功能论的总体性则意味着，“某一问题的历史实际上变成诸问题的历史。某一问题的文献表达方式，表现为某一历史整体的表达方式，表现为这一历史整体的各种可能性、界线和问题的表达方式。”[14]85 它实际上启示我们，由于社会历史的任何一个问题都与无数其他的问题语境发生着互相指涉的关系，所以关于某一个问题的阐释必须联系整个历史语境与其他许多问题一起来进行，同时对某一个问题的说明也可以因此而折射出整个历史时代的问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这个问题就充当了一个历史总体性的功能镜像，中国古代所谓的“一叶落知天下秋”中的“一叶”与“天下秋”的关系就较为形象地演绎了这种功能论总体性的确切含义。

其次，后现代主义本身就构成一种否定性的总体性。从前门被后现代话语驱逐的总体性经过一番语焉不详的处理和神情暧昧的装扮之后又在后门悄然被延请进来了，显性的反总体性立场与潜在的总体性渴望恰巧表征了后现代对于总体性的那种首鼠两端的复杂心绪。伊格尔顿将后现代主义所羞于承认的这一点无情地抖落出来了，“一种对于总体性的怀疑，无论是左的还是右的，通常都是假冒的。它通常转化成为意味着对某些总体性的怀疑和对其他种类总体性的热情认可。某些种类的总体性——监狱、主教、身体、专制主义政治秩序——是可以接受的谈论话题，而其他种类的——生产方式、社会变革、教义体系——则被悄悄地加以管制。”[1]16 不难看出，伊格尔顿不点名地羞辱了福柯、德勒兹、利奥塔等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言述矛盾。伊格尔顿一针见血地指出，后现代论者的反总体性也无非是“用同样抽象的拒绝普遍性代替抽象的主张普遍性”[1]76。这就类似于阿多尔诺用“星丛”概念来表示一种否定性的总体性是一样的。所以，在后现代论者那里，反总体性更多地是出于策略的需要，“它们将通过对总体性概念的反动来重新确立总体性概念的地位。”[15] 否则，就可能被认为是资本主义主流话语的同谋者，因为“不寻求总体性正是不正视资本主义的代码。”[1]16 就此而言，人们提出这样的质疑就是正当的，“事实上，难道后现代概念或者后现代状况概念不是也预设了一种设想社会从先前阶段向一种新阶段过渡的大师叙事，一种总体化观点吗？难道这种理论方法不是也同时预设了一个现代性概念和一种历史的彻底断裂或决裂，而这种决裂导致了一种全新状态的出现，从而才使得后现代一词获得了存在的根据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后现代’这个概念不就同时也预设了某种大师叙事和某些总体性概念，并因而预设了一种新的历史断代思想和总体化思想，而这岂不正是利奥塔以及其他后现代理论家试图反对和屏除的那种认识论作法和理论上的傲慢自大吗？”[2]224 如果让我们说出后现代那些难以启齿的私下考虑，那就是他们需要一种从个体事物、片段生活或微观历史基础上所建构起来的功能论总体性模式，杜绝那种连批判的现代主义者也一样嫌恶的实体论总体性模式，如果事情并非如此的话，我们就只能说，后现代主义既误会了一些现代主义者，也误会了它自己。

四、结语

后现代主义在一系列理论命意上存在的自我掣肘与两难处境充分表明了它本身的问题状态，准确地说，它充当了现代主义的问题意识和危机征候。它以自身的决绝性状与决不妥协的立场使

现代主义那些藏匿深久的沉疴积弊得以昭彰于阳光下,并造成一种振聋发聩的效果,即通过全面公开现代主义的悖谬并放大这种悖谬,从而使悖谬更显悖谬,也使问题的性质更其严重。基于这样的关系语境,我们选择更多地把后现代主义视为某种问题而不是某种答案就决非偶然了。也就是说,作为一种问题意识,后现代主义对于社会文化具有同样程度的积极意义,原因就在于问题最为集中、最为严重之处,也正是历史最为深刻、最有希望的时刻,一如马克思所说的,"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的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6]更为重要的启示还在于,"问题的提法本身已经表明应当向哪个方向去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17]从这个角度看,后现代主义成为某种类型的问题非但不是一种耻辱,反而是某种荣誉。

参考文献:

[1] [英]特里·伊格尔顿. 后现代主义的幻象[M]. 华 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 [美]斯蒂文·贝斯特,道格拉斯·凯尔纳. 后现代理论[M]. 张志斌,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3] 徐 贲. 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4] 宋立元,主编.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386.
[5] 王岳川,尚 水,编. 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00.
[6] [美]大卫·雷·格里芬. 后现代精神[M]. 王成兵,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7] JEAN-FRANCOIS LYOTARD. The Inhuman[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25.
[8] ZYGMUNT BAUMAN. Modernity and Ambivalence[M]. Cambridge: Polity, 1991.
[9] 彭在钦. 论后现代主义元小说的形式技巧表演[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5).
[10] [英]齐格蒙·鲍曼. 立法者与阐释者[M]. 洪 涛,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495-496.
[11] 张汝伦. 思考与批判[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12] [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 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M]. 程小平,译//汪民安,陈永国, 马海良,主编. 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13] [荷兰]佛克马,伯顿斯. 走向后现代主义[M]. 王 宁,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14] [匈]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M]. 杜章智,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52.
[15]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政治无意识[M]. 王逢振,陈永国,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43.
[1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89-290.
[1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40.

Critical Research on Post-Modernism Idea

LI Sheng-qing
(*The Study Base of Chinese Ancient Literature and Social Culture,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Post-Modernism as a cultural existence, it embodies that the mame"post-modern" itself is ironic; its indistinct division of historical periods implies an uninterrupted connection with modern or even pre-modern time; itself as an overall strueture of strategic or functional negative grand narration. In fact, the internal paradox of post-modernism makes it raise questions rather than solve problems.

Key Words: Post-Modernism; Modernism; functional name; dating; ironic expression.